

校园新观察

# 同学,为什么你涉嫌抄袭还不自知?



大学进入期末季,正是学生提交课程论文的时候。有老师反映,刚进入学习生涯的新阶段,一些大学新生就在“不自知”的情况下,触碰了学术规范,涉嫌抄袭惹了麻烦。他们有委屈,认为“论文查重系统出错了”。大学老师看着查重报告,亦替他们遗憾。

值得大家深思的是,从初高中阶段写作教育过渡到大学的学术写作,这当中是否有需要填补的空白?

■陈晓茜

刚受过中国高考洗礼的大一新生在大学课堂上,往往表现出明显的“矛盾”特质——一方面对大学阶段的学习充满了好奇、冲劲,认为这是一个全新的开始;另一方面,却还深深地受到高

中阶段乃至更早之前初中阶段学习思维的影响。

笔者在西交利物浦大学给大一学生主讲《中西文化比较》课程,这也是学校一年级第一学期的公共必修通识课,这门课程每年面向至少3600名学生开设。在学期初,教师组便会明确告知学生,他们提交的作业将经

由权威查重系统检测,通过比对国内的学位论文数据库、学术期刊数据库、互联网资源等,以判断其答案的原创性。一旦查重率高于课程规定的30%,作业将被判定为抄袭;一旦该生两次被判定为抄袭,教务处的档案上将会留下抄袭记录,从而影响今后的学业。

在查重系统的“火眼金睛”下,连我们老师都不敢相信:怎么有那么多名学生在开学伊始就抄袭?甚至有同学在开学三周内的记录就让老师不得不将此通报教务处。

我们不得不反思,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老师和学生对“抄袭”的认知差异?

## 大学“踩过线”的学生,通常是高中写作训练模式下的好孩子!

在教学设置上,我们的课程由三个环节构成:课前,要求学生针对老师提供的学习资料进行预习;课上,老师在两个小时之内讲授相应专题;课后,老师及助教团队会根据课程中的知识点,结合社会热点问题和文化现象,在校内网站上发布四篇延伸阅读材料和对应的讨论话题。学生可以任选感兴趣的话题作答,对问题进行论述和评议。

让很多“写作能力”貌似不错、自我感觉也很好的一大一新生栽了大跟头——不少学生因为涉嫌抄袭,而在学业档案上留下了不良记录。特别需要注意的是,那些被判抄袭的学生们,却不认为自己在抄袭,他们显得非常委屈!为此,师生双方有时甚至会进行长达一个学期的拉锯战。

为什么在抄袭这件事情上,师生们的认知会出现这样的差异?学

生在基础教育阶段接受的写作教育,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为什么会令他们进入大学后屡次遭遇“抄袭”的风波而不自知?

之所以在此毫不客气地将问题指向基础教育中的写作训练,是源于我们的教师团队对大一学生们抄袭情况的分析。通过分析一学期中几百例被判定为抄袭的学生答案,并与学生进行沟通后,笔者发现,这些在大学“踩过线”的学生,却是现阶段初高

中写作训练模式下的好孩子!他们发自内心的认为,自己写下的那些文字,源于高中时期背诵的作文素材。按照学生的话说,“明明是记在脑袋里滚瓜烂熟的东西,现在把它写下来,又有什么错呢?我在高考作文里也是这么写的啊!”更有相当多的同学直接冲到老师办公室,或气愤,或诚恳,或委屈落泪,拿着自己带来的高考作文素材摘抄本,试图证明自己并非有意抄袭,甚至没有抄袭。

## 写作动辄“傍名人”引名言,而大学老师想问:“同学,你自己的观点在哪里?”

学生们在针对延伸阅读材料和问题作答时,主要存在以下三个问题。

“来上大学,还带着高中的作文素材摘抄本。”

在开学第二周,本课程留给学生的材料,和时下流行的人文综艺节目有关,希望他们谈一谈自己喜欢的一首诗,结合案例讨论现代社会中人们是否还需要读经典。

L同学写道:“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苏东坡经过酸、甜、苦、辣、咸,五味杂陈之后,最后一个味觉是淡,所有的滋味都尝过了,你才知道平淡的精彩,你才知道一碗白稀饭、一块豆腐好像没有味道,可是这个味觉却是生命中最深的味觉,我觉得苏东坡在感谢:他不断放下,每一次的放下就让他更好一点,这就是‘淡’的可贵。”

当这部分回答被查重系统标示为和网络资源100%重合时,L同学在发送给老师的邮件里提到:“提问问的是自己喜欢的一首诗,我对这首诗印象很深,自然而然就写出来了,该点评是高考作文优秀语段,高中老师也要求背诵。”

可是,对于大部分将老师的话奉若圭臬的高中生来说,恐怕也没有想过,自己的语文老师让大家背诵的素材,往往也来自网络。如果高考作文将来也推行在线写作,接入查重系统,不知道会引发什么场面。

如果真如L同学所说,他是自然而然看到诗歌就直接搬运了高中时的素材,那么接下来,笔者又做了一个实验:结合课程的专题,不断调整问题设置,试图让学生没那么容易将思路联系到高考作文,而是请他们结合自己的生活经历、所见所闻,围绕所提供的阅读材料和问题来表达自己的观点。

譬如,当课程讲到工业革命专题时,为了令学生思考工业时代生活、现代城市生活和农业时代生活的差异,笔者选取了来自乡村的“网红红人”发布的乡村生活短视频等相关素材,先让学生谈谈自己平时看不看这类“土味”视频,喜不喜欢这样的风格,再讨论为何这两年乡村题材的短视频会如

此流行。

原以为这样风格的提问可以尽量避免学生再次引用曾经的摘抄,但仍旧出现了类似情况。

Y同学写道:“以前有所谓的安贫乐道,其实是最好的生活方式。白天种田地,晚上参悟人生道理,粗茶淡饭,活得自在明白,死得也自在明白。现在的人,这两样都没了。在城市里生活,六根应接不暇,满脑子都是欲望利益,满脑子都是小聪明,还以为这就是人生……”

在接到涉嫌抄袭的通知后,Y同学亦表示:“因高中我们针对乡土这方面的材料进行背诵,可能想法上有些接近。”然而,查重系统数据显示,不仅仅是想法相似,该生上文的语段,100%和网络资源重合。

可以说,这些学生或许都是初中语文老师心目中的乖孩子,牢记教导,高考作文分数或许都不低。但是,背着别人的文字,并将这一写作习惯带到大学的作业中来,在查重软件下无所遁形。此时,他们遭遇的不仅仅是答题计零分、抄袭记录上报教务处,更是一次对信念的暴击。为什么以前的学习中受到鼓励的事情,进了大学却说是错的,还带来这么严重的后果?

“明明写了‘鲁迅先生说……’为什么还判我引用不规范、抄袭?”

在被查重系统判定为查重率过高

的学生中,大多数学生的申诉还包括:我明明在回答里写了“专家说”“莎士比亚说”“有新闻报道过”,这不是已经标注出引用了吗?我从来没想过抄,为什么还判定我抄袭?

在对“娱乐会不会至死”的讨论中,学生J的作业旁征博引,连续引用了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的名言,《周易》中的名句,以及引用鲁迅的“我向来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揣测国人”一句,其间还引用新闻报道中诺贝尔奖获得者——中国科学家屠呦呦的事迹,用来对比娱乐圈明星的待遇和关注度。

这样的作答如果放在高考作文里,说不定是高分作品。然而按照大学对学生的写作要求,该回答被查重系统检测出了60%以上的查重率。学生往往不解,难道“我已经标明了引用来源,为什么还说是抄袭?以前我高中老师让我们多引用名人名言,难道是错了吗?”

在此,大学老师还要耐心对学生作出回应:其一,任何在作业中的引用,必须要注明参考文献的来源,以书籍为例,需精确到作者、年份、书名、出版社、版次等,这还是该类目下最基本的参考文献所需信息;其二,引用可以,但是必须要注意引用比例。

中学阶段,常常有通篇充满着名人名言的作文被当做范文来展示,也有不少语文老师鼓励学生多引用名人名言,让鲁迅、梭罗、范仲淹、莎士比亚等人成为自己的“亲友团”,而学生自己的观点或许只占20%甚至更少。但

在大学,老师会反问:“同学,你自己的观点在哪里?”到了大学生的毕业论文阶段,查重率的比例甚至会被要求低于15%,如果再按高中作文的这一套路,或许学生连学位都拿不到。

“我的文辞那么优美,为什么得不到高分还被判为抄袭?”

在觉得委屈的一部分学生中,还存在这样的情况:该生充分调动了自己组织优美语言的能力,并且引用材料,原本预期有个好分数——毕竟华丽的排比句、丰富的形容词,亦是高考作文中的制胜法宝之一,然而却事与愿违,落了个查重率过高的结果。

为了引导同学们对城市文化进行思考,笔者也曾为学生提供了卡尔维诺《看不见的城市》的相关选段,以及世界上不同风格的城市案例,试图让同学们谈一谈自己理想中的城市是什么样的,为什么会这么构想。

K同学写道:“很可惜,随着城市的高速发展,沧海桑田,物是人非,城市早已不再是记忆中的模样。以现代化为特征的城市化,自然不能拒绝高楼大厦,但也绝不是冰冷灰暗的水泥森林,绝不是割裂历史的横空出世。将城市融入自然,接续继承,既有现代繁华,又有历史脉络的城市,才是真正的、人们居住其中并能感受到内心充实与美满的城市……而城市里的你们,没有安静,更听不见声音。”

行文优美吗?确实挺优美。会得到高分吗?并不会。K同学的答案中同样涉及查重率过高的问题,不仅如此,光是他的这段话,看起来华丽,却空洞无物,均是“正确的废话”。

以上三个问题,只是笔者工作之余的“吐槽”。这些大学新生,刚进入学习生涯的新阶段,就在“不自知”的情况下,触碰了学术规范惹了麻烦。在这背后,或许更值得大家反思的是,从初高中阶段写作教育过渡到大学的学术写作,这当中是否有需要填补的空白?由此,在笔者看来,规范的学术写作,应该列为大学入学教育的必修内容。

(作者为西交利物浦大学中国文化教学中心教师)

一位大学老师挂职云南国家级贫困县后的观察与思考

## 教育扶贫,才能真正“让世界变平”

■曹东勃

内陆贫困地区与沿海发达地区的差距是全方位的,教育也不例外。自去年七月来到云南元阳县这个国家级贫困县挂职、协助分管教育的半年多来,我的

派出单位上海财经大学在人、财、物各方面对这里的教育扶贫工作提供了全面支持。这个过程中,我越来越体会到,教育均衡发展之间的区域差异和城乡鸿沟,的确有望通过点滴努力而逐渐缩小。这种信心不是钱砸出来的,而是基于对教育制度变化趋势的一种预期和判断。

### 新高考改革队伍中的“后卫”,也在摩拳擦掌

前不久,我去相邻的一个县城的一所重点高中,实地考察他们试行了半年的“分层走班”教学改革。其实,这就是在新高考改革全面推进过程中,学校自身教学理念和管理模式的一种自主探索。这所高中也和上海的学校一样,尝试打破原有固化的行政班建制,实施选课走班分层教学。偌大的高中教学楼里,高中生像大学生一样,在不同的教室中组成一个个流动的班级,课堂很有活力,教学也井然有序。

云南属于新高考改革队伍中的“后卫”,是最晚实施的几个省份之一,尽管仍然存在不同的声音,但显然这场改革脚步已经迫近。据我所知,在这里,2017年和2018年的高考语文试卷的整体阅读量已从7000字上升到9000字,到2020年左右还将上升到1.2万字。这也意味着,在新高考改革全国推开之前,命题的指挥棒就已在引导学校走向必须重视学生课外阅读和自主学习道路了。继续被动等待和观望的后果,只能是不进则退,甚至颗粒无收。

贫困县有贫困县的难处,起点太低,差距太大。元阳县去年1100多个考生,一本上线仅六人。但也正因如此,反而也有一种绝处逢生、自我激励的胆量,折腾一下,未必更差,也许更好。

真正能够让世界变平的是教育,是教育带来知识的共享、观念的更新和视野的开阔。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说“一块屏幕”能够给贫困地区的孩子带来什么改变的话,那么缩小与城市孩子眼界的差距,是最重要的。

新高考改革在某种意义上产生同样的催化效果。眼下正是大学期末考试的时候,前几天一位老师兴奋地对我说,他发现大一、大二这两届学生的课程论文水平,整体要比前面几年好很多。我也有同感。我的一个猜测是,这两届学生进入大学的阅读量起点,就比以前的要高,这可能与新高考改革之下高中教育思路的转变有莫大的关联。这种不可阻挡的趋势甚至让远在西南国家级贫困县的我都已感受到了。相比前面提到的邻县的教育水平,我所在的元阳县还是相对落后的。县里的两个高中校长都忧心忡忡地谈到,必须马上启动选课制改革和扩展学生的阅读量了。

要知道,高中搞选课制,要满足一些基本的硬件条件。比如,必须做好1/3左右教室轮空的准备。简单地说,如果教室不够用,教师配备不足的话,要么课程开不出来,要么教室安排不过来,最终都推行不下去。即便如此,这里的学校也都摩拳擦掌,要创造条件推行教改。



### 乡村中小学走出困境,“第一推动”只能是教师

高考改革的指挥棒对整个教育领域上下游的深刻影响和改变,可见一斑。当一个教育欠发达的贫困县都开始琢磨这个事情的时候,江浙沪等发达地区的状况可想而知,一定是动手更早,影响也更深远。当然,它的另一个可能后果或有待解决的问题是“堤内损失堤外补”,校内看似减负了,校外其实更累了,因为对学生综合素质的要求其实更高了。

和十几年前的那种“上课拖堂”或有组织的“补课游击战”相比,当下人们的心思更活络了。那时候是想方法给你灌输增量,实际上是用时间换空间,所谓“高观点下的初等数学”,让你用超前的高阶工具解决低阶问题。所以,那些年流行的各种习题集、精编之类“超纲题”泛滥,就是要把你往“高层次”带。

相比之下,当下的课外培训机构泛滥却是“堤内损失堤外补”,“堤外”明显在挖“堤内”墙角,若是课堂上老师“留一手”,学生再不参加补课,恐怕基本内容都学不到。所以能够看到当下教育部门的治理思路双管齐下:既坚定不移地搞“堤内”的“去产能去库存”,也坚定不移地正本清源、治理“堤外”乱象。

新高考改革的这种指挥棒效应,不仅在发达地区让新教育理念逐渐落地生根,贯穿学生培养的全过程;也让发达地区对贫困地区的教育扶贫,有了一个更好的接

口,实际上可以一直延伸到义务教育阶段中,学生兴趣的发现、习惯的塑造和人格的养成。这也是上海市多年来一直探索的“大中小学一体化改革”的成功经验。

对于贫困山区来说,乡村教师“下得去、留得住、教得好”的压力远比为学生减负迫在眉睫。这半年,我去过30个乡村中小学,对于师资方面的压力体会深刻。要让困难重重、千头万绪的乡村中小学走出困境,“第一推动”只能来自教师。

乡村教师特别需要被理解,也特别需要培训的机会。很多城市的大中小学教师,对各类培训并不看重,甚至觉得耽误时间,但乡村教师太珍视这些机会。每一次师资培训、教学比赛,都是对乡村教师极大的激励和鼓舞,其实也是让他们从繁重的教学任务中稍事解脱和放松。乡村教育尤其要注意因陋就简、就地取材、因材施教、扬长避短。特别是在九年义务教育阶段,更不能盲目跟风,超出自身水平,以己之短去一路狂奔地“唯分论”。因为一来必须考虑到生源水平的累积改善,不可一蹴而就;二来也必须清醒认识到,现有师资很难有较强的驾驭能力,去兼顾应试目标与呵护学生的学习兴趣。因此必须有所取舍,在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地区乡村中小学教育应该重在培养与呵护学生的学习兴趣。

### 扶贫先扶志,这比增收多少重要得多

在挂职后我了解到,原来,很多国家级贫困县里,会同时有各个条线、系统、地方派出的挂职干部。比如元阳县的县级干部中,挂职的就有五名。其中,有的企业从1992年就对口援助,主要工作是基础设施建设、修路、建楼。也有上海各区的对口帮扶,大约从1996年开始,重点在产业扶贫、就业扶贫。而教育部直属高校的滇西对口帮扶是2013年开始的,主攻教育扶贫、智力扶贫。

当然,我身边的很多朋友有时也不理解,为什么扶贫这么长时间,还存在这样大的差距?我一般会打一个比方:这就像小学应用题里经常遇到的那个“灌水放水”的追及问题。贫困地区在努力脱贫,可是发达地区也没有停步,仍

在快速发展。必须承认,消灭贫困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区域的发展也不会是一个静态的追赶,只能尽力追求“灌水”的速度快于“放水”的速度。

对于教育系统在滇西挂职的这批人来说,有一个共同的认知,就是教育扶贫光荣而重要。每当看到乡村中小学孩子们嬉笑打闹、听到校园里的朗朗读书声,见证贫困的村庄里建起最牢固最气派的教学楼,我们都不断提醒自己,他们是这里的明天、未来和希望。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彻底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只有靠教育。扶贫先扶志,治贫先治愚,这比今年比去年收入增加了多少、明年比今年收入增加了多少,更加重要。

(作者为上海财经大学副教授,现挂职云南省元阳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